

1951—1958年

整党运动研究

赵亮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51—1954 年整党运动研究

赵 亮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51—1954 年整党运动研究 / 赵亮著.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3

ISBN 978-7-5656-3293-8

I. ①1… II. ①赵… III. ①中国共产党—整党运动—研究—1951—1954 IV. ①D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03345 号

1951—1954NIAN ZHENGDANG YUNDONG YANJIU

1951—1954 年整党运动研究

赵亮 著

责任编辑 孙少红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http://cnupn.cnu.edu.cn>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80 千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目 录

绪 论	(1)
一、研究状况综述	(1)
二、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15)
三、主要创新点和难点	(18)
四、主要研究方法	(23)
五、本书结构	(24)
 第一章 整党运动发动的历史背景	(26)
第一节 执政党建设任务的提出与公开建党	(26)
一、执政党建设任务的提出	(26)
二、老区与新区的公开建党工作	(29)
三、整党任务的提出	(39)

第二节 各地对党的基层组织的初步整顿	(47)
一、老解放区的初步整党工作	(48)
二、新解放区的初步整党工作	(59)
 第二章 整党运动的发动	(80)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召开	(80)
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	(80)
二、党内关于整党问题的争论	(93)
第二节 “整党为一个时期中心工作”	(105)
一、整党工作与全党理论教育工作的结合	(105)
二、整党工作与清理“内层”工作的结合	(113)
第三节 各地传达与贯彻整党决议	(122)
一、各地传达整党决议与制定整党计划	(122)
二、各地培训整党干部与进行整党的典型试验	(139)
 第三章 整党运动的发展	(153)
第一节 “整党工作必须与‘三反’运动相结合”	(153)
一、“三反”运动的发动	(153)
二、“三反”运动与整党工作的结合	(160)
第二节 整党任务的发展和丰富	(166)

一、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成为整党运动的主要任务	… (166)
二、各地的整党工作调整	… (181)
第三节 整党运动在城市的结束	… (195)
一、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成为干部审查和鉴定工作的	
主要任务	… (196)
二、“德才兼备”原则成为干部选拔工作的根本标准	… (199)
 第四章 整党运动在农村的继续推进和结束	… (207)
第一节 农村整党任务的转变	… (207)
一、农村推迟开展“三反”斗争与暂停整党工作	… (207)
二、农村整党任务的转变	… (215)
第二节 农村整党运动与互助合作运动的结合	… (223)
一、农村整党工作结合互助合作运动而重启	… (223)
二、党内就农村整党过程中是否反对“单干”问题的争论	… (233)
三、坚决推进互助合作运动成为党在农村的中心工作	… (244)
第三节 农村整党运动与“新三反”运动的结合	… (252)
一、农村中止“三反”运动与继续“关门”整党	… (252)
二、“新三反”运动的发动及其与农村整党运动的结合	… (263)
第四节 (农村)整党运动的结束	… (286)
一、各地第一批农村整党工作的完成	… (286)

二、西北、东北地区整党工作的基本结束	(290)
三、1951—1954 年整党运动的结束	(299)
结 语	(315)
参考文献	(337)

绪 论

一、研究状况综述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历次整党运动都是重要的历史事件，不论是对党的自身建设，还是对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就中国共产党来说，所谓整党(风)工作主要包括整顿党的思想作风和整顿党的组织等两方面工作。在党的历史上，比较重要的整党整风运动主要有：1942—1943年的全党整风运动(延安整风)、1947—1949年的解放区(老区)整党运动、1950年的全党整风运动、1951—1954年的整党运动、1957年的全党整风运动、1963—1966年的整党运动、1969—1971年的整党运动，以及1983—1987年的整党运动。其中，1951—1954年的整党运动主要是整顿基层党组织的思想和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地整顿党的基层组织，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

中国共产党的历次整党整风运动，在中国的中共党史学界以及相关各专业、学科领域，一直是较受关注的问题。专著方面：1. 专门研究整党整风问题的著作，主要有(以出版时间的先后为序)：《中国共产党历次整党整风》(王一帆、陈明显)和《谈谈中国共产党的整党整风》(杨一凡、罗锋、王天曾)等。2. 在专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

(组织)建设史(纪事)的著作中,整党整风问题均是得到比较详细的述论的问题。这类著作主要有:《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赵生晖)、《中国共产党建设史》(陈至立主编)、《中国共产党建设史》(朱汉国、谢春涛、梵天顺主编)、《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道路》(蔡长水、叶梧西主编)、《党的建设七十年纪事》(吕澄、张竹梧、钟碧惠、苏希圣、贺晋清主编)、《中共党建史 1949—1976》(宋晓明主编)、《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建设史》(张明楚主编)等。

论文方面:1. 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整党整风问题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主要有(以发表时间的先后为序):《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的全民整风运动初探》(胡燕)、《论建国初期农村整党》(王锋德)、《1947—1949 年的整党运动》(季春芳)、《1957 年开展整风运动的原因浅析及其评价》(吴保平)、《1957 年整风转向反右的历史思考》(喻冰)、《河北整风反右运动中的肃反问题考察》(李秋生)、《太岳革命根据地土改整党问题研究》(李鑫)、《一九五七年基层整风运动研究》(孔雷)等。2. 研究该问题的其他学术论文主要有:《论党的历史上的整风整党》(黄兆康)、《建国初期整风整党的历史经验》(汪曙光)、《论建国初期的整党运动》(李庆刚)、《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王先俊)、《解放战争时期土改整党中晋察冀区村干部阶级成分问题的由来》(徐进)等。

而在国际上,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伴随针对当代中国政治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学者,也陆续开始对中国共产党的整党整风(*party rectification or the rectification of the party's work style*)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并且出现了专门研究该问题的学术成果,专著主要有:《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 Rectific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Party Norms, 1950—1965》(Frederick C. Teiwes)和《Elite Discipline in China: Coercive and Persuasive Approaches to Rectification, 1950—1953》(Frederick C. Teiwes)等。论文主要有:《Conflict and Non-compliance in Chinese Politics: Par-

ty Rectification, 1983—87》(Bruce J. Dickson), 《The Secon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2th CCP Central Committee: Rectification and Reform》(David S. G. Goodman), 《Party Rectification i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1983—87》(Alastair I. Johnston), 《The Origins of Rectification: Inner-Party Purges and Education before Liberation》(Frederick C. Teiwes), 《Reconstruction and Rectific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Shanghai Underground: 1931—34》(Lawrence R. Sullivan)等。此外,近几十年来,国际上还有许多当代中国政治问题的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或不同程度上,论及中国共产党的整党建党问题。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From Revolution Cadres to Party Technocrats in Socialist China》(Hong Yung Lee), 《China, Libe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1942—1962》(Bill Brugger), 《Organizing China: the Problem of Bureaucracy, 1949—1976》(Harry Harding), 以及《Keeping the Revolution Going: Problems of Village Leadership after Land Reform》(Thomas P. Bernstein)等。

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情况来看,专门研究1951—1954年整党运动的学术成果很少。总体来说,对此问题进行的专门研究和各类相关研究,具体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1951—1954年整党运动发动的原因。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包括对此次整党运动发动的历史背景以及对中共中央发动此次整党运动的意图的把握

对此,国内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的研究路径和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即依据1950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195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整党建党问题的决议,以及195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等相关文件和决议的精神,分析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前

后党的组织的基本状况和存在的问题，而后指出：1951—1954 年的整党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其所处历史地位发生根本变化的历史背景下，在 1950 年整风运动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和思想而发动的。

国外的相关学术研究对该问题的认识存在着一定差异。

一种观点是，整党运动的发动，是为训练党员干部掌握执政的本领，同时解决新干部与老干部间的矛盾、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间的矛盾，增进党的内部团结。持该观点的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 Hong Yung Lee 所著《From Revolution Cadres to Party Technocrats in Socialist China》。“From”一书重点考察的是 1949 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制度的演变，并将整党运动看作这一演变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历史事件。该书认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面临着干部严重缺乏的问题。例如，湖南省解放时，包括南下干部、本地的地下党员干部与游击力量在内，总计有约 15000 名党员干部，再加上地方化的一部分解放军部队，远远不足以满足共产党执政湖南省的需要（其时湖南省有约 1800 万人口）。为弥补干部缺口，各地开始大规模地进行选拔干部的工作，干部来源包括青年知识分子、群运积极分子，以及非党（旧有）知识分子和职员等。在此过程中，各地新、老干部间产生了许多矛盾。另一方面，该书提出，在当时党员干部绝对数不足的同时，还有很多党员干部是不合格的，这主要表现在他们文化水平很低，难以满足领导建立政权、重建社会秩序，以及恢复经济等项现时需要。此外，南下干部（外来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还存在着较多的矛盾。为解决这两方面问题，中国共产党决定对基层组织和干部队伍进行整顿和训练。此外，该书也认为中国共产党在 1951 年 3 月开始整党，是为了清理坏分子，以及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以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保证党员质量、提高党的战斗力。

另一种观点是，中国共产党决定发动这场运动，主要是基于朝

朝鲜战争对党内所带来的影响的考虑。Hans J. van de Ven 在《War, Cosmopolitanism, and Authority: Mao from 1937 to 1956》一文中提出了这一观点。文章认为，为保证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物质供应，中国政府面向国内的大量采购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也“导致腐败的产生，以及一些政府和党的干部与私商的勾结”。另一方面，朝鲜战争的爆发也在中国国内激起一片恐慌，即中国共产党内有很多叛徒存在，且前国民党政府在大陆布置下了大批的特务和间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 1951 年，中国共产党发动了整党运动，以解决这两个问题。

还有一种观点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发动整党运动，主要是为了克服官僚主义，增进党和民众的关系。Eddy u 所著《Disorganizing China: counter-bureaucracy and the decline of socialism》一书坚持这一观点。该书认为，1949 年以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致力于建立起一个“反官僚主义”的政治管理体制。这种体制既有别于中共在革命年代所坚持的那种政治管理体制，也与现代官僚制度有着很大的差别。该书提出，毛泽东和列宁都坚持认为，现代官僚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和工具，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整党运动，就是毛泽东基于克服官僚主义考虑而发动的。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发动整党运动，主要是出于“继续革命”考虑，特别是教育农村党员干部在土改后要继续保持革命思想，促进农村先于城市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转变。例如，Thomas P. Bernstein 在《Keeping the Revolution Going: Problems of Village Leadership after Land Reform》一文中即提出了这一观点。文章认为，新中国成立前后，在土地改革完成的广大农村，中国共产党在当地的领导普遍遭遇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获得土地的农民群众大多坚持小农经济，这影响到了村干部的态度和行动，使后者多想退出政治活动而专心发家致富；另一个问题是，农村地区党的组织的任务越来越繁重，这迫使当地干部多

采用命令手段和强迫手段来开展工作，这种工作方法严重危害到了农村地区互助合作工作的开展。这些问题的存在，促使中国共产党决心在农村地区进行思想和组织整顿。

Harry Harding 所著《Organizing China: the Problem of Bureaucracy, 1949—1976》一书则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初期发动整党运动，有着多方面的考虑。其一，如同 1949 年之前一样，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初期即又发动整党，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希望以此反对官僚主义。其二，朝鲜战争的爆发和中国的参战，促使中国共产党努力加强基层组织政治可靠性，清除不可靠的党员干部，并进行“清理内层”的工作。其三，新中国建立初期干部缺乏的状况，特别是技术干部和有经验的干部缺乏的状况，助长了基层干部队伍中命令主义错误的增长。为此，中国共产党认为必须整顿这种不良作风。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亦认为命令主义作风的增长，还与党和政府的上级机关的压力有关，“很多情况下，基层干部命令主义错误的产生，是上级领导不切实际地摊派任务的结果”。此外，命令主义错误的产生，另外，在很多情况下，也是由于基层干部所需参加的会议多、所需作的报告多。为此，要整顿命令主义的不良作风，就需将官僚主义和会议多、报告多等问题一并整顿。其四，上述诸多问题的存在，使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担心“党会走到国民党的老路上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看来，党必须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因此，中国共产党决定进行整党。

Frederick C. Teiwes 在他的《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 Rectific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Party Norms, 1950—1965》《Elite Discipline in China: Coercive and Persuasive Approaches to Rectification, 1950—1953》等专著中，《The establishment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new regime, 1949—1957》等学术论文中以及在他参与编写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中，都有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整党运动发动原因的论述。总的来说，相较国际上其他进行过相关研究的

专家学者，Frederick C. Teiwes 因更多地参考了其时中共中央组织部就整党建党问题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以及其他相关的中共中央文件，因而他取得的相关研究成果与大陆学者的观点更趋一致。综合他各项相关的研究成果，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 1951 年发动了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运动，一方面，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面对迅速发展的胜利形势，中国共产党在各地的组织普遍经历了党员的大发展，以克服党员干部的严重缺乏问题，党的领导人认为，在这一过程中，有些地方的建党工作出现了偏差，降低了入党条件，由此带来了党员队伍的不纯问题。为此，就需要对党的组织进行巩固和整顿，清理那些坏分子。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初期的主要工作就是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从这种意义上说，“整党工作就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的一系列工作中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党的组织和成员现时面临的各项工作是他们所不熟悉的，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所熟悉的一套工作方法与时情况是不相适应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培养党的执政能力，就需要对党的思想和组织进行整顿。

（二）关于 1951—1954 年整党运动的过程及运动中所采取的方法

国内相关研究成果一致认为，此次整党运动基本上是按照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部署来进行的。即：第一，训练整党工作干部。第二，对党员普遍进行关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员标准的教育。第三，进行整党工作的典型试验。第四，组织整顿，即首先进行党员登记，而后对党员进行审查和鉴定，最后对党员分别作出组织处理意见。同时，各相关研究结果也普遍认为，此次整党运动的一个特点是结合各项政治运动和工作任务来进行的，特别是与“三反”运动结合在一起。此外，多数相关研究成果都对此次整党运动清理和新吸收的党员人数进行了说明，各研究引用的数据一致表明，此次整党运动的组织清理力度是比较大的。例如，赵生晖所

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宋晓明主编的《中共党建史 1949—1976》、蔡长水等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道路》，以及朱汉国等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建设史》等研究成果都引用的截至 1953 年 6 月底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1953 年 6 月底，共有约 65 万中国共产党原党员被清洗或淘汰出去。此外，这些研究成果所引用的相关数据还一致显示，结合此次整党运动进行的建党工作取得很大成绩，截至 1954 年底，全国共新接收中共党员 282 万人，新建党支部 17 万个。

国外相关研究对此次整党运动的过程的认识存在差异。

Frederick C. Teiwes 在他所著《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 Rectific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Party Norms, 1950—1965》一书中提出，1951—1954 年的整党运动本身是一个完整的历史事件，是紧随 1950 年的整党(风)运动开展起来的。Harry Harding 在他所著《Organizing China: the Problem of Bureaucracy, 1949—1976》一书中提出了同样的观点。该书提出，1950 年 6 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讨论并决定了在 1950 年的后半年和 1951 年的前 3 个月进行一场整党运动，而后再用 3 年的时间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即 1951—1954 年的整党运动。

Bill Brugger 在他所著《China, Libe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1942—1962》一书中则提出，1951 年开始的“三反”运动与同年开始的整党运动密不可分，该书甚至强调，当时中国所进行的各项运动及各项运动的每个组成部分都是密不可分的。依照这个观点，该书在实际上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整党运动分作了 1950—1952 年、1953—1954 年两个阶段。依照该书，前一阶段的整党运动一开始是封闭进行的，但进入 1951 年，由于整党运动与“三反”运动的结合，及中共中央推行农业互助合作的需要，整党运动变成了一项公开进行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而后再一阶段的整党运动则主要指的是“新三反”运动，即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与反对“五多”运动。

Harry Harding 所著《Organizing China: the problem of Bureauc-

racy, 1949—1976》一书则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头4年间发起了三次整顿党组织的运动：一是1950年的反对骄傲自满、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运动；二是1951—1952年的“三反”运动；三是所谓的“新三反”运动。该书提出，在这些运动中，持续进行的是党的组织的整顿，整顿的方式是将党员队伍中不能完全合乎共产党员标准的人清理出去。

与此同时，国外相关研究对此次整党运动所采取的主要方法的认识是比较类似的，即针对基层党员干部、特别是农村党员干部主要采取了思想教育的手段，没有过多动用纪律和行政处分等强制性的手段。

Frederick C. Teiwes 在他所著《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 Rectific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Party Norms, 1950—1965》一书中提出，整党本身就是一种相对温和的对待党员干部的方式，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所进行的大清洗有着本质区别。因此，1951—1954年整党运动是一场和风细雨式的政治运动。对此，毛泽东和刘少奇是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的，意在避免重复1947—1948年老解放区整党工作中“左”的错误。

Thomas P. Bernstein 在《Keeping the Revolution Going: Problems of Village Leadership after Land Reform》一文中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文章说，在农村的整党过程中，虽然中国共产党强调了绝不允许农村党员坚持剥削思想和剥削行为，例如，1953年2月，中共中央华北局在一份文件中就说，坚持剥削思想和剥削行为的党员干部将被清除出党，且根据文件，山西省一些地方已因此清除了部分农村党员，但是“党的领导人还是更强调挽救这些党支部而不是将其摧毁”。文章认为，总体来看，此次整顿农村党支部的工作中，特别是在1953年“新三反”运动启动后，反对农村基层干部中普遍存在的命令主义错误的主要方式还是教育和宽大处理，中国共产党认为“农村党员干部不应为工作中的强迫命令问题负全部责任”，相反，“这

些问题被认为应经过思想教育的方式加以解决”，“纪律和行政处分被用的很少”。

Bill Brugger 所著《China, Libe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1942—1962》一书认为，中国共产党于 1950 年启动的整党整风运动，本来是封闭进行的，没有动员广大群众的参与，随后因 1951 年“三反”运动的启动，群众开始参与到整党运动中来，并被鼓励去批评党员干部。但是，这种群众的参与，一直在按照计划进行，基层党组织并没有被剥夺领导和控制局面的权力。伴随 1953 年中国共产党开始决定在中国大陆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全面推行苏维埃模式，整党运动变得相比来说更为温和，重新又开始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进行，“清洗发生在一个封闭的整党运动中”，不再与群众的大规模参与相联系。例如，在城市和工矿企业，发动群众的目的已变成鼓励其去支持各项既定的方针和政策，“保证群众为实现既定的各项生产目标而努力工作”，而不是去努力寻找和斗争犯有贪污、浪费等问题的党员干部。

Lowell Dittmer 所著《China's Continuous Revolution: The Post-Liberation Epoch, 1949—1981》一书则提出，新中国成立的初期，是“工程师方式”的鼎盛时期。所谓“工程师方式”，根据该书的观点，即通过平静但却精心地组织安排来领导发展和建设党的各项事业，这种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恰如“液压工程师去操动水面的升降”一样。这种方式强调“顺序”——“例如革命必须严格依照步骤来进行”、“精英”——“例如命令必须依照严格的级别来从上下达”和“计划”——“例如预先会有一个对任务的级别设置，为完成这个任务，各级别分别承担相应责任”。与“工程师”方式相对应的，是以“风暴”（即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的方式来领导发展和建设党的各项事业。这种方式强调的是“同时性”——“例如所有的事情都是同时发生，但这并不是因为其事先经过协调和安排”、“平等性”——“党内级别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的，鼓励基层的创新”和“自发性”。该书提出，革